

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 动态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石智雷*

摘要：本文利用武汉市迁移劳动力的调研数据，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城生活状况和城乡收入预期做了分析，并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借助计量经济学工具，研究了在城就业状况和长期保障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水平受到个人特征、在外就业经历、将来打算和长期保障状况等多方面变量的显著影响，但不同年份间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迁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在 2005 年后对其农村收入预期有着更大的效用。接受过技能培训、挣钱后希望留城发展或者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要求更高一些。随着在城就业时间的延长以及非农务工经验的积累，农村迁移劳动力会根据城乡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劳动力价格的波动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城乡收入预期。

关键词：迁移劳动力 城乡收入预期 留城最低收入 长期保障

一、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们一直在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影响，认为收入差距在城乡迁移决策中占据中心地位，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迁移规模、区位选择和迁移时间等。而在托达罗迁移模型中，城市是存在失业的，决定城乡迁移的不是城乡收入差距，而是考虑了在城市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的城乡预期收入（Todaro, 1969）。Stark（1999）在检视了托达罗及其许多延伸的理论模型后发现，预期收入的概念几乎成为这些模型探讨迁移行为时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与动机。在托达罗的理论中，劳动力的迁移主要取决于相对经济利益的刺激，其中经济上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并且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劳动力的经济预期，也就是心理上的考虑和认识，而不是实际的城乡工资差异。其中，预期的差异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异和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两个变量相互作用决定，或者说城市预期收入是经过城市失业率和工业扩张率调整过的现代部门的工资。同样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是否选择回流，也会受到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只是迁移劳动力对于城乡的预期不仅仅是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以及获得工作的概率，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如在城市的生活成本、适应性、未来发展空间以及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等等。

国内外关于收入预期的研究相对较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Manski, 1993, 2004; Dominitz and Manski, 1996），尤其是 Manski 等学者在研究设计和测量方面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尝试，奠定了本领域的研究基础。在理论研究中，学术界认为收入预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另一种是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理性预期模型需要满足的条件是，个人拥有关于不同情境中市场工资水平的完美信息，并通过处理这些信息形成对未来工资水平的无偏预期（Manski, 1993）；适应性预期模型较之理性预期放宽了假设条件，认为现时生活中人们只能掌握有限信息，他

* 石智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信箱：shizhilei2004@126.com。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济转型中的农民工能力发展与社会融合”（项目编号：71173240）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对市场工资水平及其变动情况进行观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对自己的收入预期。这种预期可能存在有偏性,但是个人可以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的灵敏反应来重新调整预期(Freeman,1976)。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利用调研数据对影响个人收入预期的相关因素做了实证研究,如Smith和Power(1990)研究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会影响劳动者对金钱的态度,进而直接影响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收入预期;Brunello等(2004)也认为个人的收入预期会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但是家庭背景中主要发挥作用的是社会关系资源的多寡。张珂和赵忠(2011)研究认为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就业意愿和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都显著地影响劳动者的收入预期,但是2003-2009年这7年间影响机制发生了变化。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对于劳动者收入预期的研究还较少,在实证研究方面,也主要集中在家庭背景特征对个人收入预期影响关系的探讨。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预期数据本身往往难于搜集和整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可能认为预期数据存在较多的主观色彩,所以更倾向于搜集和分析实际发生的数据(Manski,1993)。

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是他们对城乡认识的集中体现,也是将来迁移动向的“先行指数”。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是对迁移劳动力在外收入状况(王美艳,2003;田丰,2010)及回流意愿的研究(任远,2006;蔡禾、王进,2007;蔡玲、徐楚桥,2009),所涉及的也是单指标因素,还未见就迁移劳动力的城乡预期做深入的分析。在我们所构建的模型中有三点和托达罗模型中的假设有所不同,其一是迁移劳动力对城乡的收入预期是考虑到城乡生活成本的,不仅仅考虑交通成本和工作搜寻费用。其二是迁移劳动力在外出之前已经通过社会关系资源把工作安排好了,然后才外出务工。在做出迁移决策时,首先依据的是对欲迁入地点的就业信息,例如有无就业岗位以及是否适合自己工作等,并对这些信息是否准确进行判断,为了提高进城后找到工作的概率,他们的信息主要依靠在外地打工的亲友提供,而不是凭借道听途说的信息或个人的主观臆测。其三,迁移劳动力都是以非正规部门的工资作为收入参照的。农村劳动力要进城务工,是以在城市非正规部门获得一份工作为目标的,并且对在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是以非正规部门工资收入为参照的。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城生活状况和城乡收入预期做了分析,然后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出发,借助计量经济学工具,研究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因素,并重点探讨了在城就业状况和长期保障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

二、数据介绍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介绍

本研究以在武汉市务工的农村迁移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从武汉市的流入地角度我们也称之为迁移劳动力)^①。之所以选择武汉市作为抽样地点,主要是考虑其在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城市功能和劳动力结构方面的代表性。武汉作为湖北省省会城市,兼有其他许多大城市的特点,不仅有其“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更因其作为中部重要城市所具有的代表性特征,常常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实证研究的对象。武汉市有大量人口,其中农村迁移劳动力占了较大比重,另外还有大型工业企业和发达的商贸业。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年底武汉市常住人口达978.54万人。

我们分别在1998年和2005年对武汉市迁移劳动力^②做了两次抽样调查。这两次调查我们使用基本相同的问卷,调查地点都是武汉市主城区,调查方法都是采取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问卷涉及家庭基本状况、个人职业经历、迁移与流动过程等90多个问题。在1998年的调查中,选取了武汉市7个城区中的4个城区作为调查点,主要考虑到这4个城区特征明显。武昌区是政府机关和高等院校集中的城区;青山区内坐落着

^①农村进城劳动者多被称为“迁移劳动力”,但是这一称谓已经不能很好的反映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因为大多数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再从事工农兼业行为,更有一部分迁移劳动力在农村没有了土地和房屋,彻底实现了就业转移。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更是如此,他们没有农村务工经验,很多还是在城市出生和成长,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统一使用的名词为农村迁移劳动力,或者简称为迁移劳动力。

^②本项调查定义迁移劳动力为“外地农村户口、居住本地三个月以上”的就业人群,对迁移劳动力按就业形态划分为雇员与雇主(包括自我就业)两种。为了更清楚地考察迁移劳动力的这种职业分异,我们将迁移劳动力按照职业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雇主或自我就业,另一类是雇员或员工。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雇主”的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中的雇主,它包括了大量非正规部门的自我就业者,相对于雇员,这类人是非工资性收入者,简称雇主。

武汉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是传统的工业区;硚口区位于汉口,区内有全国闻名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也是传统商贸区;洪山区内有很多城乡结合部,且聚集了大量的城中村和农业人口。实际调查并获得有效问卷2 600份。在抽样分布中,调查对象户口在外地的劳动力有1 651人,过去5年内迁入武汉市并有武汉市户口的劳动力573人,在武汉市居住15年以上的本地劳动力595人,其中后两类主要作为对照样本。2005年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先分层抽取7个主城区的50个社区,然后在每个社区中随机选择12户组织专门调查员入户调查。发放问卷共计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93份,有效率98.8%。在我们调查的数据中,就业形式属于雇员的迁移劳动力占迁移劳动力就业总数的28.6%,雇主或自我就业的迁移劳动力占71.4%。

(二) 样本描述统计

在1998年调查数据中,户口在外地的劳动力的中位年龄为29.9岁,过去5年内迁入现在已经有武汉市户口的劳动力的中位年龄为32.6岁。从性别结构来看,户口在外地的劳动力中男性稍多,而过去5年内迁入现在已经有武汉市户口的劳动力中则以女性稍多。从婚姻状况来看,过去5年内迁入的劳动力中未婚的比重均在30%以上。从文化程度来看,户口在外地的劳动力中约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过去5年内迁入现在已经有武汉市户口的劳动力中具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各占约1/3,而本地居民中具有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占45%。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人口中,过去5年内迁入、现在已经有武汉市户口的劳动力和本地居民的比重达20%左右,大大高于户口在外地的劳动力。从家庭规模看,雇员平均家庭规模在3.7~3.9人之间,雇主在4.1人左右。

在2005年武汉市调查数据中,男性占60.7%,平均年龄33.35岁,被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18~43岁,占总样本的87.8%。分雇主和雇员来看,受访雇员的平均年龄为28.56岁,其中男性占58.6%,未婚者占50.6%;雇主的平均年龄为35.32岁,男性占64.2%,未婚者只占雇主总样本的8.1%。从文化程度方面来看,雇主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25%,而作为雇员的迁移劳动力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只占14.8%,雇主中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稍高于作为雇员的迁移劳动力(参见表1)。

表1 1998年和2005年武汉市调查样本分布及其基本特征

年份	1998年抽样调查											2005年抽样调查	
因素	NHK	HK	UR	雇员	雇主	NM1	NM2	HM1	HM2	UR1	UR2	雇员	雇主
样本数	1 645	521	563	1 734	995	840	805	396	125	498	65	162	408
男性比重(%)	59.0	47.0	57.0	56.0	58.5	58.0	60.9	51.3	37.6	56.4	69.2	58.6	64.2
婚姻状况													
未婚比重(%)	32.2	31.1	13.1	36.7	13.1	50.6	13.3	36.9	11.2	13.3	13.8	50.6	8.1
年龄(岁)													
中位数	29	32	40	30	32	6	31	30	36	39	40	28.56	35.32
平均数	29.9	32.6	40.2	31.8	33.5	27.4	32.4	31.7	35.6	39.1	42.2	26.00	35.00
家庭规模(人)						3.72	4.08	3.76	4.11	3.83	4.14	2.33	2.08
文化程度													
文盲(%)	1.7	1.4	1.2	1.0	2.2	1.3	2.1	1.3	1.6	0.4	4.6	2.5	4.4
小学(%)	16.6	8.0	7.1	9.1	18.9	13.2	20.1	5.6	14.4	5.0	12.3	12.3	20.6
初中(%)	66.7	38.4	26.4	47.1	62.5	67.9	65.5	32.1	52.8	24.1	44.6	61.7	53.2
高中/中专(%)	13.6	33.9	45.0	29.3	15.3	15.6	11.6	36.4	28.0	46.8	36.9	19.1	19.9
大专及以上学历(%)	1.4	18.3	20.3	13.4	1.1	2.0	0.7	24.7	3.2	23.7	1.5	4.3	2.0
居住情况													
自有房屋(%)	6.8	42.6	35.0	19.1	18.8	4.4	9.4	31.8	63.2	33.7	49.2	0.6	2.0
单位宿舍(%)	11.6	45.7	59.8	40.1	8.8	19.6	3.4	56.1	26.4	61.8	43.1	45.1	0.5
租住私房(%)	55.3	6.6	4.0	17.5	66.5	31.2	80.2	6.8	8.8	3.0	7.7	43.8	33.3
寄居亲友家(%)	1.8	2.8	0.7	2.3	0.8	2.5	1.0	3.8	0.0	0.0	0.0	3.1	0.2
住雇主家(%)	10.7	0.2	0.0	9.9	0.6	20.4	0.7	0.0	0.0	0.0	0.0	2.5	0.2
工棚(%)	10.5	0.0	0.0	9.7	0.5	20.0	0.6	0.0	0.0	0.0	0.0	0.6	0.2

注:(1)由于一些问卷不完整,导致这里的汇总数和有效问卷数存在一定差异。(2)我们将1998年调查样本按其户口及就业形式分成以下几个大类,即:NM1,户口在外地的劳动力(以下简称迁移劳动力),现为雇员或员工;NM2,迁移劳动力,现为雇主或自我就业等;HM1,在过去5年内迁入武汉市现已有当地户口(也称之为正式移民),就业类型为雇员;HM2,正式移民,就业类型为雇主或自我就业;UR1,在武汉市居住15年以上并有武汉市户口(也称之为本地居民),就业类型为雇员;UR2,本地居民,就业类型为雇主或者自我就业。迁移劳动力,简记为NHK;正式迁移劳动力简记为HK;本地居民简记为UR。(3)表中数据来自于1998年和2005年武汉市外来人口调查。

三、迁移劳动力在城生活状况与城乡预期

(一) 迁移劳动力的城市生存能力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自己能否在城市中生存下来,而生存是要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在本研究中,我们用职业和收入两个指标来衡量迁移劳动力的城市生存能力,它们不仅仅是迁移劳动力城市生存状况的体现,也反映迁移劳动力在当前及未来的个人发展情况。

1. 职业

从迁移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分布来看,武汉市的迁移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并且从1998年到2005年,迁移劳动力在第三产业分布的比重逐渐增加。在1998年作为雇员的迁移劳动力还有61.7%分布在第二产业,到了2005年这一比重下降到22.2%;雇主在第二产业比重也从1998年的22.7%下降到2005年的3.2%。雇员在第三产业分布比重从1998年的38.2%上升到2005年的77.2%;雇主在第三产业的分布比重也从1998年的66.7%提高到2005年的96.6%。1998-2005年,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逐渐从商贸零售行业转移到餐饮和社会服务行业,就业选择面更广,选择方式更为灵活。

从雇主的所有制类型来看,1998-2005年迁移劳动力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比重在明显上升,从1998年的57.64%提高到2005年的77.45%。而在1998年个体户和个人就业的比重较高,两者占到总就业的94.16%。从雇员就业的所有制类型看,1998-2005年迁移劳动力在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就业的比重明显下降,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中就业的比重上升较大。1998年有39.40%的迁移劳动力进入国有或集体企业就业,而到2005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4.82%。迁移劳动力在股份制企业就业的比重也有所上升,2005年达到8.02%(参见表2)。

表2 迁移劳动力就业的所有制类型 (单位: %)

类型	雇员所在单位类型					雇主类型				
	国有或集体企业	股份制企业	私营企业	个体户	其他	合伙业主	私营业主	个人就业	个体户	其他
1998年	39.40	5.12	22.98	25.83	5.95	2.24	2.98	36.52	57.64	0.62
2005年	14.82	8.02	32.71	43.21	1.23	0.49	10.29	11.76	77.45	0.01

注:表中数据来自于1998年和2005年武汉市外来人口调查。

2. 收入^①。

从调查结果来看,1998-2005年,迁移劳动力的个人收入有明显的增长,其中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比雇员的人均工资增长幅度要大。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月收入增长了1.33倍,而作为雇员的月工资增长了63.3个百分点。但是在迁移劳动力中,雇主群体内部收入有着明显的分异。2005年,雇主中的最高月收入是20000元,最低的只有300元,其中66.3%的雇主月收入集中在1000~3000元之间;而作为雇员的迁移劳动力月工资最大差异只有2700元,且月收入在500~1200元间的占到了71.9%。

(二) 迁移劳动力的城市适应性

1. 就业变动

从调查资料看,迁移劳动力的职业流动程度很高,并且流动的次数在逐渐增加。1998年,迁移劳动力流动次数在2次及以上的占54.1%,3次及以上的只占样本的3.35%;而到2005年,有96.88%的迁移劳动力换过2次以上工作,换过3次及以上工作的也有31.97%,远高于1998年时的就业流动次数。2005年,就业流动2次的雇主要高于雇员,前者是67.82%,后者是58.2%;就业流动次数在3次及以上时,雇主所占的比重开始小于雇员,尤其是流动次数在4次及以上时,雇主只有6.91%,雇员达到了12.29%(参见表3)。

^①劳动收入的定义和统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由于迁移劳动力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以及收入形式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使得收入变量很难把握。在武汉市1998年和2005年外来人口抽样调查中,我们将受访者按就业形式分为雇员和雇主(包括自我就业)两类分别调查其收入。对雇员来说,其就业收入指全部货币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等,不包括单位提供的住房、分发的实物及提供的其他福利等非货币收入;对雇主调查的是经营性净收入。

表 3

迁移劳动力就业变动状况

年份	变换工作次数 (%)					变换工作的原因 (%)						
	类型	1 次	2 次	3 次	4 次及以上	收入原因	福利待遇原因	工作强度原因	生活原因	工作调动	单位经营性原因	其他
1998 年	总体	45.90	50.76	2.92	0.43	68.28	1.12	8.89	9.34	0.56	3.60	8.21
	雇主	41.61	55.03	2.98	0.37	71.06	0.00	10.00	9.79	0.00	2.55	6.60
	雇员	50.00	46.67	2.86	0.38	65.16	2.39	7.64	8.83	1.19	4.77	10.02
2005 年	总体	3.12	64.91	23.98	7.99	67.45	2.35	6.67	11.76	0.59	4.31	6.86
	雇主	0.80	67.82	24.47	6.91	69.79	2.41	5.88	11.23	0.53	4.01	6.15
	雇员	4.10	58.20	25.41	12.29	63.64	2.48	9.09	11.57	0.83	4.96	7.44

注:1998 年为最近一次变换工作的原因 2005 年为进城后第一次变换工作的原因。表中数据来自于 1998 年和 2005 年武汉市外来人口调查。

2. 劳动合同与单位福利

能否签订正式有效的劳动合同是衡量迁移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就业合同签订的内容来看,在 1998 年签订的合同更侧重于工资待遇,几乎所有的合同中都会涉及到工资状况,而在 2005 年只有 81.08% 的合同涉及工资状况。在 2005 年签订的合同中对工伤、医疗保险等更为看重,分别比 1998 年高出 12.53 个百分点和 21.21 个百分点。另外,在 2005 年就业合同中有一半以上涉及到劳动者的工作年限,而在 1998 年只有 0.5%。由此也可见,从 1998 年到 2005 年迁移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在增强。

从单位提供的福利状况来看,迁移劳动力关注的福利内容主要是在生活的基本需要层次,如饮食和住宿。在 1998 年调查数据中,有 94.4% 的迁移劳动力得到了单位提供的免费住宿,在 2005 年只有 53.09%;而免费用餐的比重却在上升,从 1998 年的 31.55% 提高到 2005 年的 63.58%,增加了 32.03 个百分点;其他物质福利也从 8.21% 提高到 28.4%。单位提供公费医疗、社会保险和探亲路费等的迁移劳动力比重并无明显变化。没有获得任何福利的迁移劳动力比重有所增加,从 1998 年的 5.83% 上升到 2005 年的 17.28% (参见表 4)。

表 4

迁移劳动力的劳动合同与福利状况 (%)

劳动合同	签订就业合同的劳动力比重	签订以下合同内容的劳动力比重					
		工资	工作责任	工伤	医疗保险	其他福利	工作年限
1998 年	37.20	100.00	44.11	25.31	8.52	20.30	0.50
2005 年	22.80	81.08	67.57	37.84	29.73	18.92	51.35
单位提供的福利	免费住宿	免费用餐	公费医疗	社会保险	物质福利	探亲路费补助	没有任何福利
1998 年	94.40	31.55	4.76	4.64	8.21	4.17	5.83
2005 年	53.09	63.58	4.32	3.09	28.40	4.32	17.28

注:(1)表中数据来自于 1998 和 2005 年武汉市外来人口调查。(2)本表中只是分析雇员身份的劳动力的劳动合同与福利;合同和福利内容的问题都是多选的,表中列举的数据是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中选择这一内容的比重。

3. 城市消费与家乡汇款

据调查数据分析显示,从 1998 年到 2005 年迁移劳动力的房租支出和日常生活支出在增加,并且每年往家乡汇款的次数和金额也在增加。从开支情况来看,1998 年作为雇员的迁移劳动力人均每月房租支出 119.05 元,每月生活支出 237.09 元,到 2005 年分别提高到 148.34 元和 285.88 元。从数据分析中发现,2005 年迁移劳动力在城挣钱的目的以在城市中进行生产再投资为主^①,占到总数的 40.2%,其次是能够在城市买房子长期生活居住,占到总数的 13%,另外有 20.7% 的迁移劳动力挣了钱是用来提供家庭消费,如供子女上学、家庭日常花销等,而不是进行自己生活的长期投资^②。

从往家乡汇款情况来看,1998 年作为雇员的迁移劳动力人均每年往家乡汇款 2 178.27 元,到 2005 年上升为 3 040.74 元;比较来看,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人均年汇款金额要低于雇员,1998 年只有 1 974.49 元,到 2005 年上升为 2 658.92 元,依然低于雇员往家乡的年汇款金额。由此可见,迁移劳动力依然和家乡保持

①本部分在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为“您挣的钱主要准备如何开支”。
②供子女上学也是长期投资,不过是父母对子女的投资而不是其自身生活的投资。

着比较亲密的联系 ,尤其是资金联系;但是雇主与家乡的联系较之雇员要弱一些(参见表 5)。

表 5 迁移劳动力的城市消费

类型	年份	每月房租支出(元)			每月生活开支(元)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雇员	1998	119.05	100.00	92.53	237.09	200.00	178.00
	2005	148.34	120.00	88.29	285.88	250.00	190.09
雇主	1998	297.62	180.00	438.45	362.78	310.00	195.17
	2005	508.39	400.00	464.29	289.68	300.00	179.86
类型	年份	每年往家乡汇款次数(次)			每年汇款金额(元)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雇员	1998	3.42	3.00	2.83	2 178.27	1 500.00	3 326.46
	2005	7.44	12.00	4.96	3 040.74	2 400.00	2 409.77
雇主	1998	4.22	3.00	3.58	1 974.49	1 000.00	3 083.25
	2005	6.07	3.00	5.12	2 658.92	1 800.00	2 740.17

注:表中人均数据是有支出和汇款额度的劳动力的平均值。数据来源于 1998 年和 2005 年武汉市外来人口调查。

(三) 迁移劳动力的城乡预期与回流意愿

统计分析显示 ,从 1998 年到 2005 年迁移劳动力对城市和农村的收入预期都有所增加 ,农村预期收入的增长幅度稍高于城市预期收入 ,前者增加了 62.74% ,后者增加 61.91%。在 2005 年 ,迁移劳动力对城市的预期收入平均为每月 729.14 元 ,对农村的预期收入人均均为每月 354.92 元。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来看 ,2005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374.22 元 ,比 1998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232.24 元) 高出 61.14%(参见表 6)。

表 6 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

年份	类型	样本数	均值(元)	中位值(元)	标准差(元)	最小值(元)	最大值(元)
1998	城市收入预期	448	450.33	300	371.32	100	4 000
2005		139	729.14	600	445.51	100	3 000
1998	农村收入预期	1 417	218.09	200	148.38	20	900
2005		537	354.92	300	293.02	30	3 000
1998	城乡收入差距	-	232.24	100	-	80	3 100
2005		-	374.22	300	-	70	0
1998	留城最低收入	1 555	389.32	300	349.40	100	3 000
2005		593	628.63	500	379.56	100	3 000

注:表中数据来自于 1998 年和 2005 年武汉市外来人口调查。

留城意愿可以反映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也在一定程度体现劳动者对自己在城生存能力的认可。因为一般来说对于理性人 ,只有那些认为有可能留下的人才会有着更为强烈的意愿。总体来看 ,绝大多数迁移劳动力希望能够留在城市就业和发展 ,占到总数的 76.4% ,其中有 57.9% 的人是下了决心要留在城市 ,不想再回到农村 ,比如有 41.7% 的迁移劳动力“想办法留在武汉” ,有 16.2% “争取留下来 ,不行就到外地打工”。另外 ,也有劳动力没有明确的将来打算 ,或者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还是打算回到农村 ,占23.6%。

四、哪些因素影响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

(一)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1. 样本资料的基本特征

样本资料的基本特征见表 7。在统计分析中 ,主要采用了二元变量的处理方法 ,例如 ,对于“性别” ,“男”赋值为 1 ,“女”赋值为 0;对于“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设置为 1 ,“非农业户口”设置为 0;同样的 ,对于“是雇主”、“通过社会关系取得工作”、“参加过技术培训”、“靠子女养老”、“希望获得城市户口”、“有往家乡汇款”等皆赋值为 1 ,相应的参照组赋值为 0。对于外出务工挣钱的目的 ,在问卷中有六个选项: (1) 在武汉买房; (2) 回家盖房; (3) 在武汉做生意; (4) 回家做生意; (5) 办婚事; (6) 其他。在引入模型时 ,我们设置两个虚拟变量 ,把(1) 、(3) 设置为 1 ,其他为 0 ,定义为“挣钱目的为留城发展” ,将(2) 、(4) 设置为 1 ,其他设置为 0 ,定义为“挣钱目的为回家建房或者回家做生意”。在实际调研中 ,对于“文化程度” ,“文盲”赋值为 1 ,

“小学”赋值为 2,“初中”赋值为 3,“高中或中专”赋值为 4,“大专及以上”赋值为 5。

表 7 城市迁移劳动力个人特征及在外就业状况的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年龄(岁)	593	33.35	8.48	0.25	0.19
文化程度	593	2.98	0.81	-0.14	0.43
性别	593	0.61	0.49	-0.44	-1.81
户口性质(1:农业;0:非农业)	593	0.87	0.34	-2.21	2.88
婚姻状况(1:有配偶;0:无配偶)	593	0.78	0.41	-1.36	-0.15
1:雇主;0:雇员	570	0.72	0.45	-0.96	-1.08
挣钱目的:留城发展	594	0.53	0.50	-0.13	-1.99
挣钱目的:回家建房做生意	594	0.18	0.38	1.68	0.84
迁来几年	593	6.89	5.60	0.99	0.75
取得工作的途径(社会网络)	593	0.19	0.39	1.58	0.50
转换工作次数(0.1、2 次以上)	588	1.12	0.65	-0.12	-0.64
月收入	593	1 800.48	2 031.30	4.58	29.75
有无培训(1:有;0:无)	593	0.22	0.41	1.37	-0.12
养老方式:靠子女	594	0.14	0.35	2.10	2.43
家中承包多少亩土地	593	2.56	3.76	4.07	27.79
是否希望获得城市户口	594	0.29	0.45	0.92	-1.16
是否往家乡汇款	593	0.78	0.42	-1.34	-0.21

注:由于表 1 中对 1998 年数据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限于篇幅,在本部分我们重点描述 2005 年武汉市外来人口数据。表中的样本数为有效样本。

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关于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我们重点考察的因素是迁移劳动力的农村收入预期、城市收入预期和留城最低收入预期。由于收入预期和其他决定因素普遍观察到的非线性相关关系,在引入模型时,我们对城市和农村的预期收入都取了对数。在收入预期决定模型中,迁移劳动力的城乡预期由个人特征变量 H 、在外就业状况变量 W 与长期保障变量 G 共同决定,其关系式为:

$$M_i = F(H, W, G)$$

其中,被解释变量三组, M_1 为迁移劳动力农村预期收入, M_2 为迁移劳动力留城最低预期收入, M_3 为迁移劳动力城市预期收入。解释变量有三组,具体包括:

(1) 个人特征变量。首先,年龄变量与收入预期的关系十分密切,一般来看,收入水平开始随年龄增加而上升,到一定阶段又会下降,对城乡收入的预期也会与年龄呈现倒 U 型相关关系。其次,文化程度也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重要因素,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对未来的收入预期相对较高。另外,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存在着就业的性别和户籍歧视,这也会转化为对城乡预期的不同。拥有城市户口的劳动力一般会对城乡收入预期较高一些,这也是本模型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模型中我们还考察了婚姻状况对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

(2) 在城就业状况。这组变量主要是考察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基本情况对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包括迁移劳动力外出务工目的、获得工作途径、就业流动性、在外就业的工作性质和收入状况等等。无论是自我经营还是开办企业,雇主的收入能力和形式都不同于雇员,对于城乡收入的预期也会有差异。我们预设,雇主对于城乡收入的预期会更高一些。外出就业的目的、在外就业时间和工作变动次数会影响迁移劳动力对未来就业发展的信心和预期。获得工作的途径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是否通过社会网络获得工作。参加过技能培训和通过社会网络获得工作的劳动力对未来在城收入的看法会有所不同,我们预期前者会是正效应而后者会是负效应。另外,迁移劳动力在外收入状况也是影响他们对城乡收入预期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当前收入较高的劳动力对于在城市和回农村的收入预期都会更高一些。

(3) 长期保障状况。这是本模型的重点和特色。长期保障已经得到了迁移劳动力的普遍重视。长期保障状况不同,他们对于在城市或者回农村后的收入预期也会不同。迁移劳动力的养老安排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迁移动向,对于未来自己的发展情况没有信心的多会靠子女养老。还有很大一部分迁移劳动力保留着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农村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长期保障性的功能。但是要继续保有农村土地,他们就需要和农村保持一定的联系,而往家乡汇款就是保持这种联系的手段之一,也是维系与农村家庭感情和关系的重要方式。有一部分迁移劳动力希望获得城市户口,这也是他们获得在城市生活保障的一个主要途径。

(二) 回归结果与分析

1. 城乡收入预期决定因素的变化

为了比较不同年代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决定因素的变化,我们对1998年和2005年数据所建立的模型选入了基本相同的解释变量。从表8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1998年和2005年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决定因素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农村收入预期,2005年模型中统计上显著的变量个数要多于1998年模型^①,尤其是个人特征变量在2005年模型中发挥作用的个数在明显增多。也就是说,迁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在2005年后对他们的农村收入预期有着更大的效用。对于留城最低收入的预期,1998年和2005年模型的显著变量个数差异并不明显。

比较农村收入预期和留城最低收入预期的决定因素,可以发现所选变量对留城最低收入预期的解释力更大一些,调整后 R^2 在30%以上,但是回归系数显著的变量个数又少于农村收入预期。

2. 劳动力个人特征对收入预期的影响

从估计结果来看,劳动力个人特征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农村收入预期和留城最低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城市收入预期并无显著的影响。分因素来看,年龄因素只是对2005年迁移劳动力的农村收入预期和1998年留城最低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②。文化程度对于迁移劳动力的农村收入预期和留城最低收入预期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可见那些年龄稍大、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迁移劳动力对于留城最低收入和回流农村的收入预期都更高一些。相对于女性,男性迁移劳动力对农村的收入预期会更高一些,并且对留城的最低收入要求也更高。婚姻状况只是对迁移劳动力农村收入预期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在1998年有配偶的迁移劳动力对于农村收入预期有着正向影响,在2005年是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到2005年后有配偶的迁移劳动力对农村的收入预期开始低于没有配偶的。从户籍状况来看,农业户口对于迁移劳动力的农村收入预期和留城最低收入预期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户口的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和留城最低收入预期都更高一些,因为农村中只有那些个人素质较高或者家庭有一定的经济或政治实力的才可以获得非农户口,所以他们会觉得回农村生活比较自信,在城市生活的预期也较高。

3. 劳动力在城就业状况对收入预期的影响

迁移劳动力对城乡收入预期和留城最低收入预期与他们在城市就业的状况有着直接、重要的关系。从回归结果来看,在城就业状况对1998年迁移劳动力农村收入预期的影响,较之2005年数据有一定的差异。在1998年,雇员和雇主对农村收入预期没有显著差异;靠自己进城找工作的对农村收入预期更高;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对农村收入预期会更高一些。而在2005年,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明显要高,依靠社会网络进城找工作的对农村收入预期更高;且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更高。与挣钱后准备回乡建房或做生意相比,进城务工目的为挣钱后留城发展对农村的收入预期反而有正向影响,并且当前在城市就业时间较短、收入水平较高的对农村收入预期更高一些。

迁移劳动力在城就业状况也是影响他们对留城最低收入预期的重要因素。相对于雇员,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要求更高一些。挣钱后希望留城发展的对城市收入预期比挣钱后就返回农村的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预期要高一些。因为他们如果希望留在城市生活和工作,那么他们对于在城生活成本的估计就会更为充分,并且他们的留城意愿和动机更为真切。当前收入水平越高的迁移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预期也会更高一些。因为当前收入水平较高的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生活花费也大,根据弗里德曼的“齿轮效应”,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所以对城市最低收入预期也会越高。另外,在城市里接受过技能培训比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他们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果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回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离开。

4. 劳动力长期保障状况对收入预期的影响

长期保障状况是本模型引入的一组特色因素,它也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未来发展和迁移动向的关键。从回归结果来看,长期保障状况对于迁移劳动力的留城最低收入预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农村收入预期的作

^①虽然1998年模型的样本量要远大于2005年模型,所以在这里可以排除样本量大小的影响。2005年的样本量有537个,做一般的OLS回归已经算是大样本。

^②因为调查数据的对象是在城务工的迁移劳动力,年龄段主要介于17~50岁之间,所以年龄稍大的劳动力也就是在40岁左右。

用并不明显。只有“希望获得城市户口”这一变量对农村收入预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没有获得城市户口意愿的迁移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更高一些。长期保障状况是关系迁移劳动力能否留城的重要因素。相对于依靠单位养老、依靠子女养老的迁移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预期更低一些。家中的土地数量越多对留城最低收入预期越高,反而对回流农村的预期收入没有显著作用。另外还获得了一些定期往家乡汇款的迁移劳动力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2005年,往家乡汇款的迁移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预期更低一些,可见,这批人通过汇款保持着与农村家庭的联系,这样他们就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对在城生活也可以少了一份后顾之忧。

表 8 城乡收入预期影响因素的最小二乘估计

模型		农村收入预期(对数值)		留城最低收入预期(预期对数值)		城市收入预期(对数值)
		1998 年	2005 年	1998 年	2005 年	1998 年
个人人口学特征	年龄	0.003 (0.003)	0.007* (0.004)	0.005** (0.002)	-0.001 (0.003)	-0.003 (0.005)
	文化程度	0.165*** (0.034)	0.192*** (0.036)	0.073*** (0.028)	0.068*** (0.025)	-0.072 (0.057)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					
	男	-0.025 (0.042)	0.209*** (0.057)	0.087** (0.034)	0.059 (0.039)	0.03 (0.073)
	户口性质(以非农业为参照)					
	农业户口	-0.465** (0.192)	-0.226*** (0.079)	-0.402*** (0.156)	-0.142** (0.056)	0.005 (0.255)
	婚姻状况(以无配偶为参照)					
	有配偶	0.107* (0.055)	-0.152* (0.09)	0.025 (0.045)	0.019 (0.061)	0.049 (0.096)
在城就业状况	是雇主还是雇员					
	雇员	-0.06 (0.046)	-0.191** (0.083)	-0.094** (0.038)	-0.183*** (0.056)	-0.106 (0.084)
	外出务工目的(以办婚事或其他为参照)					
	挣钱后留城发展	0.163** (0.066)	-0.041 (0.063)	0.109** (0.053)	-0.004 (0.043)	0.243** (0.113)
	挣钱后回家建房或做生意	0.063 (0.054)	-0.228*** (0.08)	0.039 (0.043)	-0.035 (0.055)	0.037 (0.093)
	迁来几年		-0.009* (0.005)		0.001 (0.004)	
	取得工作的途径(以自找工作为参照)					
	社会网络	-0.023 (0.044)	0.012 (0.075)	-0.038 (0.036)	0.019 (0.052)	-0.162** (0.078)
	转换工作次数(0.1、2 次以上)	-0.019 (0.036)	-0.006 (0.044)	-0.013 (0.03)	-0.002 (0.03)	0.046 (0.064)
	月收入的对数	0.281*** (0.034)	0.227*** (0.041)	0.466*** (0.029)	0.39*** (0.028)	0.514*** (0.066)
	有否参加培训(以无为参照)					
	有	0.264*** (0.046)	-0.142** (0.068)	0.083** (0.037)	0.079* (0.047)	0.292*** (0.074)
长期保障状况	养老方式(以单位养老为参照)					
	靠子女		-0.034 (0.076)		-0.101* (0.053)	
	家中承包多少亩土地	0.003 (0.008)	0.006 (0.007)	-0.01 (0.007)	0.01** (0.005)	0.02 (0.013)
	是否希望获得城市户口(以否为参照)					
	是	-0.072 (0.047)	-0.168*** (0.058)	0.003 (0.038)	0.019 (0.04)	-0.12 (0.082)
	有否往家乡汇款(以否为参照)					
	有	-0.016 (0.041)	0.02 (0.065)	0.007 (0.034)	-0.097** (0.044)	-0.019 (0.075)
常数项		3.17*** (0.298)	3.72*** (0.339)	2.868*** (0.245)	3.64*** (0.23)	2.744*** (0.495)
样本量		1417	537	1555	593	448
F		14.51***	8.44***	29.91***	17.89***	8.61***
调整后 R ²		0.182	0.199	0.305	0.343	0.275

注:(1) ***表示0.01水平下显著,**表示0.05水平下显著,*表示0.1水平下显著。(2)对于“文化程度”,“文盲”赋值为1,“小学”赋值为2,“初中”赋值为3,“高中或中专”赋值为4,“大专及以上”赋值为5。

五、研究结论

当前迁移劳动力在城生活就业和长期保障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对城市收入预期的主要因素。调查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一个显著变化是迁移劳动力自有房屋的比重有了明显下降。在就业选择方面,迁移劳动力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比重在明显上升,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逐渐从商贸零售行业转移到餐饮和社会服务行业,就业选择面更广,选择方式更为灵活。1998-2005年间劳动力的工资或收入在增长,迁移劳动力中雇主收入比雇员工资增长幅度更大。迁移劳动力在城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进城目的的影响,而他们的消费方式也反映了他们对以后的打算。迁移劳动力依然和家乡保持着比较亲密的联系,尤其是资金联系;但是雇主与家乡的联系较之雇员要弱一些。作为雇员和雇主的迁移劳动力的饮食方式有了较大的分异,雇主在城生活得更安稳和舒适,更为家庭化和生活化,他们正逐渐学会和适应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从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1998-2005年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决定因素有着明显的差异。那些年龄稍大、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迁移劳动力对于留城最低收入和回流农村的收入预期都更高一些。2005年,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明显要高,依靠社会网络进城找工作的迁移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更高;且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的迁移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很高。接受过技能培训、挣钱后希望留城发展或者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要求更高一些。长期保障状况对于迁移劳动力的留城最低收入预期有着重要影响,而对城市和农村收入预期的作用并不明显。

以上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在城就业时间的延长以及非农务工经验的积累,农村迁移劳动力群体的城乡收入预期正逐步趋于理性,他们会根据城乡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劳动力价格的波动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城乡收入预期,这有利于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改善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近些年,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波动对城乡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逐步显现,进而影响迁移劳动者个体的投资和迁移的理性决策,比如从2004年蔓延开来的“民工荒”现象,严重影响了城乡经济环境,各级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手段进行适度干预。对于城市就业规制方面,应着力建设公平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环境,构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信息平台,尤其是不同地区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信息的共享和融合,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引导劳动力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对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应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制,解除农村居民和迁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应加强农村创业教育,优化创业促进政策,引导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

参考文献:

1. 蔡玲、徐楚桥 2009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 蔡禾、王进 2007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3. 任远 2006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4. 田丰 2010 《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5. 王美艳 2003 《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歧视的计量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5期。
6. 王昕、陆迁 2011 《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7. 张珂、赵忠 2011 《中国高校毕业生收入预期的动态变迁和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第3期。
8. Brunello, G., L. Claudio, and W. Rudolf. 2004. “The Wage Expectations of Europea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9: 1116 - 1142.
9. Dominitz, J., and C. Manski. 1996. “Eliciting Student Expectations of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1(1): 1 - 26.
10. Freeman, B. R. 1976. “A Cobweb Model of the Supply and Starting Salary of New Engineer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 Review*, 29(2): 236 - 248.
11. Manski, F. C. 1993. “Adolescent Econometricians: How Do Youth Infer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Studies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Higher Education*, ed. Michael Rothschild and Lawrence J. White, 291 - 31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 Manski, F. C. 2004. “Measuring Expectations.” *Econometrica*, 72(5): 1329 - 1376.
13. Smith, L. H., and B. Power. 1990. “Great Expectations: Variations in Income Expectations among Colleges Senior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3: 194 - 207.
14. Stark, O. 1999. *Altruism and Beyond,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ransfers and Exchanges within Families and Group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下转第77页)

67(3) : 297 – 308.

18. Hall R. and C. Jones.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 : 83 – 116.
19. Head , K. ,and J. Ries. 2003. “Heterogeneity and the FDI versus Export Decision of Japanese Manufacturers.” *Japanese Int. Economics* ,17(1) : 448 – 467.
20. Helpman E. ,M. J. Melitz ,and S. R. Yeaple. 2004.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94(2) : 300 – 316.
21. Melitz ,Marc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4) : 1695 – 1725.
22. Tomiura ,E. 2007. “Foreign Outsourcing ,Exporting ,and FDI: A Productivity Comparison at the Firm Lev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2(1) : 113 – 127.

Analyzing Heterogeneous Firm's Trade Model Based on Product Qualit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Tang Er – zi¹ and Sun Zhen²

(1: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School of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Following the new trade theory presented and developed , research on the enterprises export based on heterogeneity productivity ge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Product quality difference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enterprises export again , based on trade mode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heterogeneity enterprise , then the closely watched “productivity paradox” existing in exporting enterprise in China can be explained.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foreign market's relatively high requirement on the product quality of export firms will make the productivity of export firm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 – export firms , but calculating productivity by using total output and ignoring the product quality may not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export firm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 – export firms , so there may be “productivity paradox”. Finally , whether “productivity paradox” exists in the exporting enterprise is tested by using sampl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08. It is concluded that “productivity paradox” exists in the mos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Key Words: Export; Productivity; Product Quality; Productivity Paradox

JEL Classification: F14 ,C52 ,C62

(责任编辑: 陈永清)

(上接第 52 页)

15. Todaro M.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 138 – 148.

An Analysis of Dynamic Chang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Immigrants' Income Expect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hi Zhil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Reg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grant workers samples from the city of Wuh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s in city and income expect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hen constructs an econometric model to show the effect of living conditions variables and long – term security variables on immigrants' income expect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ng – term security conditions variable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income expectations of immigrants ,but the degrees are quite different between 1998 and 2005. The immigrant , who has received skills training ,wants to stay in the city or being an employer ,has the less minimum income requirements for staying in the city.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Income Expect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Minimum Wage in City; Long – term Security

JEL Classification: J24 ,J61

(责任编辑: 彭爽)